



新观察

网络文学如何作为文学

□徐肖楠

从文学异类到文学常态

传统文学对网络文学的态度经历了从喊“狼来了”到“与狼共舞”的变化，而网络文学似乎经历了从文学异类到文学常态的转换，这不是网络文学进入传统文学或者被传统文学吸纳的问题，而是网络文学自身融合网上与网下、精致与粗俗、文学与娱乐的问题。

怎么看网络文学存在基本的文学理念差异，它终归要涉及到：什么是文学、文学怎么样和怎么去看文学的问题。网络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一方面意味着文学的非文学化，一方面意味着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文学生态和发表方式决定文学的品质与命运。一个基本点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文学本质的区别吗？没有，网络文学就是文学，网络不过是一个文学发表的平台，如同期刊是所谓传统文学的发表平台一样，而网络平台变成了一种资本控制力量。

因此，文学理念差异不是根本的，根本之处在于：怎么看待网络文学不是传统文学面对新兴文学状态的问题，而是传统文学的文化资本面对新兴文学的文化资本挑战的问题。在我看来，网络文学在表面上经历了从文学异类到文学常态的转换，在骨子里是一种文化资本的转换，它带来了文学生态的转换。而现在，需要从网络文学作为“非正常文学”与“正常文学”的关系来解释网络文学，而不是从网络文学作为非文学与文学的关系来限制网络文学。

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是问题的根本点，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如果从文学本质看，两者没有区别，从不同的文化资本看才有区别：传统文学由文学期刊推动，网络文学由网络资本推动，只不过，资本对网络文学的介入、投入和控制非常强大广泛，以至于资本控制的区别似乎变成了文学本质的区别。但从根本上，资本的区别并不完全决定文学的区别。如果从文学系统内部来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仅仅在于由谁判断是文学：是由编辑还是由读者筛选和决定是否是文学。当由读者筛选时，文学的根本问题就穿越了专业编辑而直接回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就是说，文学变成了作者给予什么和读者需要什么，他们是相互直接给予的。

于是，网络文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

作者和读者的品质与情趣怎么样，进一步说就是：一方面，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是否将网络作品看做文学以及怎么样看做文学；另一方面，也是所谓传统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以至专门的编辑和批评家是否将网络文学作品当做文学。

网络文学的传统根基与反传统意识

流行在当代中国文学状态中的一般看法是，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分离，虽然现在出现了传统文学对网络文学的重新打量，但那一般仍然是站在传统文学高于网络文学的立场来收编网络文学。这是因为，网络文学以前被认为是文学异类，现在网络文学的影响强大到足以侵占所谓传统文学的领域而不得不被传统文学重视，所以，这样的文学立场通常都会以传统文学怎么样、而网络文学又怎么样的比较口吻来谈论网络文学，严格地看，这里包含着一些不自主的轻视和界限：你是你，我是我。

但是，这里忽视了：网络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学，而不是现在才变成文学，也就是说，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出现就是文学，而不是现在它被承认是文学才是文学。真正要面对的，是它会怎么样，而不是它是什么。

表面上，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似乎是相互断开的，实际上，两者具有一致的现实传统，只是在文学感受和美学传统方面有所区别。如果不将网络文学看作一种强行介入正常文学领域的媒介现象，如果不将网络文学作为被迫承认的一种文学形态，而是从一种更加深入文学传统和现实意识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那就会发现网络文学的出现是有文学本身以及现实的连续性的。

网络文学的主要意义是对文学进行机制释放——自由写作和自由发表，由此解放了写作活力，开拓了文学空间。

一方面，这与网络文学来自民间而

又作为民间化文学时尚的表现有关，它隐含着中国文学自身自由写作的传统渊源，这来源于中国民间文学自由写作传统的当代变化——中国古代民间的自由写作与网络的自由写作有一种形态上的和集体无意识的传统联系，山海经、古诗经、唐传奇、宋话本、明小说最早都是由民间自由写作开始的，网络文学可以说是以生活媒介化而对中国古典民间文学

自由写作传统的现代放大。

另一方面，这来源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文学中隐含的某些自由写作的因素。网络文学的一些写作意识实际上是90年代的文学写作意识中延伸而来，将90年代被命名的底层、身体、私人、女性、欲望等文学类群聚拢而来，会发现它们有两方面的共同意识：一是写作个人性的自由敞开；二是与现实生存意识的对应。网络文学延伸并扩展了个人自由写作的空间，将文学写作由有限的纸质印刷变为无限的网络空间。同时，网络文学更加快速和及时地与现实生活情绪相对应，并由此开辟网络文学社会而与社会意识对应。

同时，网络文学和90年代文学一样，具有现实意识的根基和传统，而90年代文学与市场化意识形态一致，网络文学则与幸福感意识形态一致，这主要是指娱乐和享受的幸福感，是文学随着生活而发生主题变化，只不过，在网络文学中更加自由地展开被现实所注重的娱乐和享受的想象性空间。

但是，虽然网络文学部分地来自90年代的文学传统，却又与90年代的文学有重要区别：90年代的文学反抗宏大叙事，网络文学不但反抗宏大叙事，而且反抗90年代文学的庄重与精致，与文学的庄重传统发生了断裂。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相互穿越

网络文学的发生是因为网络成为了文学的媒介和平台，由此得到的提示是：如果网络文学主要作为发表方式而存在，那么，在全媒体时代的生活与文学情境中，很多文学作品都可能先在网络发表，然后再印刷出版，网络起到了一种筛选作用，而这种筛选作用需要逐步完善和成熟。只不过，在网络文学发生之前，筛选作品的机制是人工的，最终印刷出版也不经过网络中继，一步到位。

在这个意义上，既然网络只是一个发表平台，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网络发表，任何在网络发表的作品都可能成为较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那么，网络文学精品就可能去掉网络二字，网络文学这个称谓就并不限于文学的品质怎么样，传统文学也不代表文学的品质一定怎么样。即是说，传统文学不意味着一定出优秀文学作品，不出劣质品，网络

文学也不意味着一定不出精品；同时，也不意味着传统文学出精英，网络文学不出精英。

这里的相关问题是：网络文学的精品怎样变成较为纯粹意义的、美学意义的文学作品，变成一种精英意识的美学表现，而不仅仅是大众化、娱乐化的粗糙文化产品。社会、历史、文学、艺术，都需要精英意识来带动，而传统的文学精英意识正在垮掉，网络文学中可能也应该培养、成长起新的文学精英意识。进一步相关的是，网络作者怎样变成网络精英，进而由网络精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精英，在此之前，网络精英并不代表文学精英。

至于网络文学的美学层次和写作问题则另当别论，但这并不影响它仍然是文学；同时，网络文学的精品并不一定比所谓传统文学中的较好作品差，而传统文学的一些作品也可能不如网络文学中的精品。例如说，最近几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步步惊心》《多多婚事》《佳期如梦》都是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

网络文学的非网络倾向与“脱网”可能

网络文学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并且随着这个时代而嵌入我们的生活中，因此，无论文学还是生活都无法排除网络文学。但是，网络文学一开始就隐含着非网或“脱网”的倾向，它们随时都可能转化为脱网形式，我们应该为网络文学作品的最终脱网有所准备。

这种脱网可能来源于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媒介化生活方式的瞬时性与不稳定性，这就是媒介化生活、全媒体时代或E时代的特点。当我们意识到一种生活方式、文学方式在生活中普遍来临时，它已经开始悄然转变为另一种事物，而这种转变的可能之一是向经典的回归。

网络文学的这种脱网倾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网络文学本身不是严格的文学概念，它既非题材，又非主题，既非内容，又非形式，它只是借用了网络这个概念，其中非文学的网络概念占据更大成分，它必然会向某种非网络概念的文学专门领域靠拢。二、文学作品借助了网络这个平台去发表，由于发表的任意性，文学也具有了任意性。网络提供的发表平台和阅读空间，但并未对文学本身有所解释。要对文学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出解释不是网络能解决的。三、网络文学具有随时可以抹去、丢失或改变的非物质文化性质，而文学的最终留存主要还要依靠物质文化的留存，即出版印刷的留存。四、有很多网络文学作家都倾向于最终的纸质出版和直接印刷，有条件的作者已经在这样做，除非作者不想让文学最终承认自己。五、对于阅读，网络阅读与纸质阅读的感受和情趣会大不一样，网络阅读感受的主要性质是“动”，而纸质阅读的感受性质主要是“静”。

■评论

由《诗刊》“2011年度诗选”说开去

□霍俊明

当《诗刊》在2011年12月(下半月刊)率先推出“2011年度诗选”的时候我想这首先是一种表率和姿态，很有些意味深长的感觉。换言之，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诗歌年选，而是对中国多年来的诗歌“年选”生态、格局甚至“标准”产生不无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诗刊》在诗人和评论家以及普通读者那里“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的荣光似乎在新媒体不断开放，发表不断个人化、自由化以及批评无序化的年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诗刊》作为所谓的“官方”和“主流”刊物仍然受到关注，但是在每一个写作愈益开放的年代似乎一个“诗刊”的容积已经难以涵括所有重要的和优异的文本。《诗刊》社在今年推出诗歌年选，其“愿望”和“出身”显然值得关注，这也是这份重要刊物多年来少有的一个“出人意料”的举措。

首先需要对《诗刊》社的这个年度选本做一个技术上的分析，这会涉及“视野”和“底线”以及编选的“可能性”问题。

这份年选涉及的诗人的数量为254(因为特殊原因其中有个别诗人重复)。“诗选”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其中“期刊扫描”(所涉及到的114位诗人成为诗选的主体)、“重点推荐”(2人)、“年度新诗人推荐”(5人)、“年度精选”(13人)、“年度网络影响力”(4人)的资源来自于《诗刊》之外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报刊；另一个就是《诗刊》自身的资源，包括“年度优秀诗歌推荐篇目”和“重大题材诗歌推荐篇目”(主要集中于《诗刊》7月号和8月号)只留存目(计116人)。显然这200多位诗人在年选中所占的位置是有“梯队”和层次性的，这首先形成了《诗刊》与其他文学刊物之间的第一个比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发问，在2011年哪个文学刊物发表的诗歌更具有说服力？哪一份刊物能够真正做到“只为优秀作品负责”？与此同时，年选的“重点推荐”、“年度新诗人推荐”、“年度精选”、“年度网络影响力”无疑是属于“着重号”的部分。性别比例和“年选”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关联，但我还是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份年选涉及的女性诗人大约在40位左右，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也给那些仍然怀有“性别”立场和情结的批评家和编选者们提了个醒，或者说在当下“性别”和写作的关系真有那么重要吗？也许作为写作者个体来说，性别和书写之间肯定存在着特殊的差异和关联，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当下的诗歌群体构成女性已然不再是“稀有之物”，其写作意义自然也不同。多年来，读到每一个“年选”时我更看重和注意那些“陌生”诗人的名字。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些“无名”和“陌生”的诗人就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而是说很多的诗歌年选已经丧失了“发

现性”，也就同时丧失了“选择性”。显然对于每一次的年选而言，有些诗人已经是“老主顾”了，每年都榜上有名，成了“名牌”，这似乎对每一本年选来说都比较“保险”，因为有这些“名诗人”撑场总不会导致“冷场”的局面。但是这无形中在一定程度导致筛子孔有些过大，那些居于“二线”和“三线”甚至“大后方”的诗人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和无情的“遗落物”。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诗刊》的这份年选我所“陌生”的诗人大约有十多位。我想这个比例已经能够说明问题，起码印证了编选者们“发现”新锐的姿态，这从单独设立的“年度新诗人推荐”可以看出。

再看看这些“诗选”的资源和来历，也即筛选范围。这就涵括40来份报刊杂志而言，可见编选视野还是比较开阔和多元的，当然这些刊物从入选的数量来看是不均等的。显然《人民文学》《星星》《诗选刊》等“中签率”最高。当然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看，还是有一些诗歌刊物(尤其是这两年刚刚出现的诗歌刊物)，甚至极少数的带有“异质”性的刊物没有进入到这份重要的年选中来。而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从我们所熟知的有“质量”保障的大刊，比如《人民文学》，每年发表的诗歌也有一定的数量。那么从中筛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否足以代表其中“最好”和“最有个性”的？而这种标准又是什么？我相信《诗刊》社编辑们的水准，这些不同的编选者所提交的篇目能够保持选择的视野、标准的多层次性，也保证了入选诗歌更大程度上的“公正”。但是，我也不能不强调，不同编选者由于诗歌趣味的差异多少会在自己的部分遗落难以进入自己“法眼”的文本。由于目前国内的年选还基本上是一般意义上的“纸质媒体”，但极其实可贵的是《诗刊》社的这份年选一个亮色就是由江非、张执浩、朵渔和人邻所构成的“年度网络影响力”，由此可见刊物和编选者对新媒体和诗歌写作关系的关注，《诗刊》也曾最早推出“博客秀”以及关于博客和诗歌写作之间关系的讨论。

显然，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媒体在“编辑”和“审稿”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总体的风格、选择标准或者基本的“底线”。有人说编辑队伍是“老龄化”最严重的，我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判断。刊物的“风格”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要求和惯性，“气质”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会保障诗歌的质量和刊物的“个性”，但是这种期刊普遍存在的“集体

关于“血性”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有言：“刚强正直的气质”。那么，什么是“打工文学”的“血性”？“打工文学”能做到刚强与正直吗？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有待作出辨析的概念。

“打工文学”从来就不缺少反抗的声音，从一开始，它就是以呐喊、愤怒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的。当然其中也不乏软性的乡愁表达，与传统的乡愁主题虽然有相似的一面，但仍然有它的独特性，比如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摇摆心态。不过，这类表达终不能代表“打工文学”的特质与阅读期待。面对人生、社会诸多方面的不公，“打工文学”集中反映了打工生活中经历的种种矛盾。当然，其中的反映是存在多种形式与缺陷的。有的仅仅囿于苦难生活的哀嚎，有的只是对具体事件的描述与控诉，有的只是莫名书写与虚构打工的传奇生涯，有的甚至对社会阴暗面作黑社会暴力性质的猎奇叙述，有的专注于带有黄色成分底层打工女性的夜幕生活，有的则进步一些，将打工者面临的苦难发挥到人性的内心挣扎层面……真正有“血性”的、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的作品并不多。这可能有“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思想自觉有待提高的一面，同时也与“打工文学”研究疲弱相关。这个责任不能只由创作主体独自承担。任何时期文学的辉煌成就，批评者所担当的角色都是必要与必须的，而不应该是各唱各的独角戏。

那么，什么是“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

首先，所谓的“血性”，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暴力，也并非纯真男儿本色式的阳刚，这不属于“打工文学”的“血性”。首先应该是具有自觉的、勇敢的、深刻地对抗现实生活与揭露现实丑恶的姿态，它不仅仅限于个人的遭遇与恩怨，而是从普通的打工生活中去发现共性的社会矛盾，比如劳资矛盾、人权状况以及在打工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系列更为复杂的人与人(特别是人与人的精神层面)之间的冲突。它必然具有排他性，这种姿态的“血性”只存在于打工生活中，它从另一侧面必然深刻反映了时代巨变之下的特定阶层的生存状况与社会概貌，它必然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层面，对人类的精神发展作出真实、独到而深刻的剖析。

其次，“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问题，并不是赤裸裸的反抗性的表达。它的书写是出于良知，而并非恶意的、恶毒的文字凶杀行为，它的“血性”不是文字暴力。它的出发点应该是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反映打工阶层的精神世界，为打工一族立言，呼吁社会的公正与公理，从而引起疗救的愿望。所以，这种“血性”是真诚的，是站在文学与思想的高度上的一针见血。并且，走出个人或某团体的小圈子，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人类精神建构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一环。任何与此相悖的文字行为，其效果都有可能会南辕北辙，更谈不上是真正的“打工文学”，也就无从谈起“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

再次，“打工文学”的“血性”体现为一种坚持。对打工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做坚韧的文字表述，创作主体不会因为身份的改变而耻于谈“打工文学”，并且不会陷入流俗，认为“打工文学”是最底层与最低级的文学品种。要充分认识到，“打工文学”本身与其他文学品种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这种坚持的写作姿态恰恰体现了写作上的“血性”，它应该远离功利，远离攀比，远离飞黄腾达的美梦。这种“血性”并非一般人所能达到，这也正是对坚持“打工文学”写作的作家们的一种考验，有“血性”与否，能否坚持就可以看出来。毕竟，“打工文学”发展至今，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也由于中国的现状，完成现代化的过渡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打工仍然是今后中国的最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打工文学”还有坚持的必要性。真正的时代杰作，或许将从中诞生。或许，它在这漫长的過程中，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或形式上的发展，但它的内质是不会变化的，它最多是之前的某种延伸与演进，所以，“坚持”不是无谓的硬挺，而是用发展的眼光去正视它。

总之，“打工文学”的“血性”就是要用现实批判的态度介入现实。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永远被人认为是小打小闹的“底层”书写，小则关心同类的生存命运，大则关心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惟其如此，才会大器起来，才会逐渐在文学界横刀立马纵横驰骋。它只有充满“血性”，完成一次次的“血性”书写，才能不负于时代大潮与中国的千年之变。

关注现实不仅是新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态势，也是世界文学的大势所趋，切入现实正为国际文学界所推崇。73岁的秘鲁作家略萨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此翁就是一个充满“血性”的作家。他对社会结构进行细致的描述，对个人的抵抗、反抗甚至是失败都给予了犀利的叙述。这与我们文中所言及的“打工文学”的精神内质是具有相当可比性的。

略萨的成功，对我们的“打工文学”是否具有启示意义呢？

“性”的面貌，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性”或“现实感”之于诗人的的重要性。也许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理想多少有些令人生疑，或者起码有些矫情；但是我想诗人必须具备写作的诚意。不管写作什么题材类型和什么风格的诗。在诗歌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生命的历史以及想象，还应感受到一个人的血肉、骨架、呼吸和灵魂。我非常认同诗人谷禾所说的“我一直对那种虚幻的乡村镜像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域外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

由“同质化”的诗歌写作我们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层面——阅读。对于诗歌刊物而言，其阅读者无外乎诗人、诗歌习作者、批评家和各大高校院所的一部分学生(更多是与文学相关的研究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小阅读”，或者说这种阅读带有小范围内的“专业化”倾向。而更令人堪忧的是各大期刊不仅形成了写作者的“同质化”，而且也对阅读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带有同质化倾向的阅读趣味和评判标准。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其结果就是每年下来，在汪洋般的诗歌大海，能够真正站立的岛屿般的诗人寥寥无几。

在《诗刊》社的“2011年度诗选”中我看到了不在少数的令我“震动”之作，当然说句有些严苛的话，我对其中的个别诗作也不太“满意”。但是，瑕不掩瑜，这应该是新世纪以来一份重要的年选。说它重要并不是说它没有局限，而是说整体上考量这是一份有效的“总结”，尽管这个总结和其他总结一样还带有待进一步打磨的粗砺和一些“惯性”运动的遗留。与此同时，我向那些被漏孔筛掉以及因为篇幅的原因未能进入这份年选的优秀诗人们致敬。这不是安慰的虚托之辞。同时，我也向那些仍然彷徨、仍然分裂、仍然有些愤青的诗人们致敬！在一个所谓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心存真诚和敬畏地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确实，有时候或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逆流而上和顶风前行。

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诗刊》社推出的“2011年度诗选”是一段诗歌历史和旅程的重要的开始。我期待这份诗歌年选会对其他的年选文化和格局形成一定的冲击和震荡。

■关注
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
□周航